

21.13

黔江史志资料选编

(三)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编印

34

目 录

- 湘鄂西苏区的创始者万涛（任光明）……………（3）
四川东南地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
（有关黔江部份摘录）……………（37）
《四川省概况》资料（摘抄黔江部份）……………（60）
旧闻新编（三则）……………（72）

编 辑 说 明

一、编辑《黔江史志资料选编》的目的，是为编写县志、专业志提供史料，起到“存史”和“求训致用”的作用。

二、凡是与黔江有关的建置沿革、疆域区划、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等资料，如调查记录、文书档案、报刊文摘、函电抄件、石刻碑文、大事记述等，都在编选之列。

三、所有编入的历史资料，除对明显的错别字进行改正，并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外，一律保持原貌。由编者所加的注释，前面均冠以“本书编者按”字样。

四、对没有标点断句的资料，一律由编者进行断句标点，并在文末加以必要的说明。

五、所有编入的资料，一律注明出处，以便查阅原件；其中一些重要的资料，如调查材料、历史文献、人物传记、大事记述等，均在文末署以提供者、抄录者或整理者的姓名，以示负责。

六、欢迎来稿。来稿不论刊登与否，均致薄酬。

湘鄂西苏区的创始者万涛

任 光 明

千里金波的洪湖，涌现出一大批若星汉灿烂的英雄豪杰。他们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当洪湖人民缅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光辉业绩时，都不会忘记贺龙、周逸群的亲密战友，为创建湘鄂西苏区而作出巨大贡献的万涛同志。

一

万涛，原名万诗楷，号铁民，一九〇四年一月出生于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正谊乡的一个土家族家庭。

一九二〇年，万涛就读于黔江县城高等小学堂。他善演讲，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有组织力和号召力，时常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夸奖。

一九二三年七月，他为了寻求真理，告别父母，告别仅新婚三月的妻子，离开家乡赴渝求学。在重庆期间，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一九二四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艰苦的革命生涯，先后辗转于重庆、上海、武汉、鄂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八年五月底，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遭敌人破坏，张计储等大部分负责人被捕牺牲。正在石首的周逸群闻讯后，“赶至沙市，组织临委，并决定迁至宜昌，”①领导鄂西各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继续同敌人奋战。

七月，湖北省委派万涛到宜昌跟特委联系。万涛戴着金边墨镜，穿一身白绸裤褂，在宜昌县委联络站——振声表店，与周逸群同志接上了头。

见面后，万涛拿出四听铁桶美福林饼干，把饼干全部倒在桌上，从一个铁桶的夹底取出两份文件。一份是湖北省委给鄂西特委并周逸群同志的指示信，信中同意正式成立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为副书记。省委在信中还同意撤销鄂中特委领导机关，所属各县改归鄂西特委管辖。另一份是中央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的指示信，信中严肃批评了周逸群要在洪湖实行暴动割据的计划，强调指出，“不要城市，就是否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结果党只有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

周逸群看完文件，对万涛说：“以我在沙市、宜昌了解到的情况看，党员、团员及工人组织微弱到了万分，没有暴动的力量和组织基础。他们虽然日子不好过，但一心想增加工资，暴动的要求并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城市暴动，成功的把握几乎是没有的。”

万涛马上回答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省委要我来鄂西时，我就要求省委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情况弄清，大多数群众现在关心的是生活而不是暴动。”

于是，万涛和周逸群议定，按照鄂西实际情况，讨论中央来信，统一了意见再报请中央。

经过特委集体讨论，周逸群、万涛的正确意见被一致通过：停止暴动，整顿内部，恢复、重建党的组织，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转向游击战。为此，周逸群把工作交给万涛主持，亲赴上海，向党中央陈述意见。在上海，周逸群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鄂西的实际情况，汇报了他和万涛为首的鄂西特委的工作计划，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许。周恩来听取汇报时的谈话内容，就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代表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的基本思想。

周逸群同志前往上海期间，万涛同志主持鄂西特委工作。他从实际出发，一面指示各县的党组织，在反“清乡”，反新军阀统治的目标下，在农村发动抗租、抗债斗争；一面注意发展城镇职工运动，团结各种群众团体，如“民权社”，“民权大同盟”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投入斗争。

特委还要求各游击队，为支持和保护群众性的斗争，继续采取日伏夜出，秘密行动的方针，并把撒传单、贴标语的政治攻势同武装行动结合起来。华容东山等地游击队提出“敌来我飞，敌去我张”等朴素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

一九二八年初冬，万涛在指导反抗敌人清乡的斗争中，不幸在华容被捕。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英勇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待周逸群从上海归来，万涛早同段德昌、彭国材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于是，特委搬迁到石首调关镇，更好地直接指挥洪湖的游击战争。

二

湘鄂边界的桑植、慈利、石门、鹤峰、来凤、五峰等县，地处武陵山脉，远距中心城市，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地理条件比较复杂，于军事上的攻守进退都较有利。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党指示贺龙、周逸群来这一带从事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湘鄂西边界党组织的力量薄弱，革命群众尚未组织起来，而且，各种旧式武装、土著部队的不良习气严重影响着革命队伍的战斗力。至一九二九年元月，贺龙同志领导的曾有三千余人，七百余枪的工农革命军，在强敌压境和内部不断叛乱的双重忧患下，仅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长期失去上级党的领导，给贺龙带来许多困难。革命武装怎样壮大？根据地怎么建设？都没有经验，只是在斗争中摸索。红军由强到弱的曲折经历，使贺龙日益感到靠宗族血缘和旧属关系，不能使红军壮大和发展。正当力量微弱的湘鄂边红军力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万涛受周逸群的委托，于一九二九年春天，代表鄂西特委来到鹤峰山区，向贺龙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和中央的重要指示。党的六大路线不是在大城市实行进攻和组织起义，而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条路线无疑是正确的。随后，万涛同志还向贺龙介绍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的光辉思想，介绍了井冈山等地区的经验，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开始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成立了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会同贺龙完成了关系到湘鄂西红军生死攸关的走马坪、堰垭整编。从而使湘鄂西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解放后，贺龙回忆这段艰难历程，对万涛同志仍缅怀崇敬。贺龙说：“（一

九二九年元月)打鹤峰收枪百余支。这时各项工作大发展了,搞群众运动,搞苏维埃。不久,万涛由鄂西周逸群处来,部队扩编,打败了王文轩(鹤峰团防头子湘鄂西团联防总指挥),”②“在短期的休整期间,我们接受了失败的教训,在连队里建立起党的支部……在打桑植以后,又改编土著武装覃甫臣部(三百余人)为第二路,并任覃甫臣为第二路指挥,万涛为党代表,辖十一、十二两团。这时,红四军已发展到一千多人,枪八百多支”。③

万涛同志在担任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期间,坚持原则,团结同志,使覃甫臣土著武装“接受了党的领导,站稳了革命立场以后,很快地改变成为可以信赖的革命武装”(贺龙语)。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覃甫臣发出“革命不成功,何以成家”的誓言,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尽管因错误肃反覃甫臣遭受排斥,几无栖身之地,连衣食也不得温饱,覃仍对革命忠心耿耿,直至壮烈牺牲。

不久,因为革命工作需要,万涛从红四军回到了鄂西特委。

为了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胜利开展斗争,特委坚持“六大”的正确路线,定期集中讨论政策、策略以及各地情况,又分败巡视各地并直接指挥军事行动。这期间,特委受破坏后,按中央指示曾一度未恢复,万涛、周逸群等以巡视员身份指挥斗争,从而使湘鄂西党的领导仍然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建立根据地而进行斗争。一九二九年,万涛爬涉于崇山峻岭,辗转在河湖港汊,足迹遍布监利、沔阳、鹤峰、桑植等三十余县,并以鄂西巡视员身份向中央写下三个巡视报告,系统地汇报各地政治、

军事、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客观情况，从中阐述他对鄂西的现状及未来的见解：

“鄂西方面，豪绅地主阶级没有因此而受着打击，根本上鄂西完全是豪绅地主势力笼罩的地方，一切地方政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鄂西全部是小农经济自给的社会，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这样的经济条件，改良主义缺少活跃的可能，政治前途，仍是一种极端野蛮的屠杀和刻骨的无情压榨。并且统治阶级为要拼命的扩充武力，镇压群众的斗争，这种现象势必更要愈加厉害。但农产品的减少，商情的冷落，军心的动摇，农村的割据，已成为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④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生活，当然是一天一天的困苦，日常大小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更加增加了许多发动的可能，事实上群众的斗争已是普遍勃兴的现象。”⑤

为此，万涛预言道：“鄂西的客观条件，确实极有利于革命的条件，只要主观力量增强，城市工作起来了，暴发了各地群众的大小斗争，不难把这个新的革命浪花向前推动。”⑥

万涛同志这些理论建树，不仅当时直接指导了鄂西的革命斗争，对壮丽磅礴的中国革命史理论，也是一个必要的丰富和补充。

由于周逸群、万涛为首的特委的正确领导，使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红色割据不断扩大。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在江陵，“郝穴、龙西两区，是割据的中心区域；龙南山区，亦呈割据的形势。所领导的群众在两万上下。”石首的“东、

北两区是割据的形势，领导的群众在五千人以上，均是经党的作用发展起来的，已有很久的历史，经过长期的斗争，比较有基础。”在监利，“农村的割据，几有全县完成的形势。一、二两区是我们的割据地，有一年以上的历史，有二万五千以上的群众。”沔阳西南也“成为割据的形势。”⑦华容东山地区也形成了红色区域，洪湖，白露湖“完全成为割据的形势。”根据地里，农协和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日益发展，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和地主豪绅的契约、地租、高利贷。这样，在河湖港汉交错的江汉平原上，初步形成一片较稳定的红色区域，这便是后来的洪湖苏区的雏形。

洪湖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迅速形成，并在后来艰苦的斗争中坚持数年，究其原因，一是以周逸群、万涛为代表的鄂西特委领导，从实际出发，吸取了井冈山斗争的若干经验，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二是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尤其有一支红色武装游击大队，担负了开辟、捍卫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三是有较好的自然条件，盛产的稻谷、菱藕为根据地军民提供了物质条件，芦苇、荷丛和港汉水网，便于军民迂回开敌。为此，毛泽东后来曾作过很高的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汉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⑧

三

一九三〇年二月，正当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准备东下时，万涛再次受周逸群委托，代表鄂西特委赶到鹤峰，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和特委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

贺龙坚决执行这一指示，立即进行东下会师的准备；把

湘鄂边游击队编成一个独立团，留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红四军则整编成四、七两个师，积极向洪湖挺进。

经过四个多月的战斗，红四军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而且还扩大了红军。六月十八日，红四军一举攻占了湖北的公安城。七月四日，红四军在湖堤与红六军胜利会师，组成红二军团，湘西和鄂西的革命根据地联成了一片，统一了湘鄂西的革命力量，不仅标志着湘鄂西地区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而且对于红军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湘鄂西苏区的巩固和扩大，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军委巡视员兼长江局军委特派员柳直荀来到了洪湖苏区，开始传达李立三的错误主张，万涛被排斥出鄂西特委的主要领导岗位。柳直荀以及以周小康为书记的鄂西特委，同周逸群、贺龙、万涛之间，在红二军团行动方针及洪湖苏区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特委及巡视员坚持《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中关于先攻荆门、沙市，完成地方暴动，然后集中红军进攻武汉的决定，因而要求红二军团立即攻击荆门、沙市等重镇。由于二、六军团刚会师不久，配合不甚密切，攻打监利时未能克敌，便撤出战斗，遭到巡视员和特委不恰当的批评。

九月中旬，受党中央派遣的邓中夏，到达洪湖苏区，担任湘鄂西党和红军最高领导职务，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企图执行以武汉为中心，命令各地红军配合行动，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柳州、桂林等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给苏区革命斗争带来了重大损失。

九月二十二日，红军再次攻打监利，获胜。二十四日，

在县城召开了原前委和原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由于万涛与柳直荀的错误主张相左，新组建的湘鄂西特委中，万涛被排斥出常委，仅担任委员。但会后，邓中夏和多数特委常委随军行动，特委实际上仍由周逸群、万涛等人负责。

一九三〇年十月初，邓中夏率领二军团占领沔阳县城、里仁口、彭家场和仙桃，接着又调头南下渡江。

十月中旬，二军团于石首、监利一带渡过长江，连克南县、华容、公安三县城和藕池、官塘等重镇。

十一月初，又攻占津市、石门，直逼澧州城下，取得了南征初战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二军团本应于初战胜利后转回南县、华容一带，但邓中夏没有这样做。在撤离津市、澧城后，邓中夏又指挥二军团继续南下攻打石门、临澧，十二月初再次攻打津市、澧州。这时，敌军大批南调，何健调集十八个团的兵力，加上湘西陈渠珍两个旅，以及收编的土匪部队，一齐向红二军团扑来。二军团虽再次占领津市，但伤亡很大，而澧州则因顽敌据城死守，久攻不克，被迫撤出战斗。

红二军团南下后是否要远离苏区去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万涛、周逸群与邓中夏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在这个过程中，邓中夏虽然“在冒进之中曾有过几次的警觉与动摇，但……终归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发展论的圈子以外。”⑨津澧失利后，邓中夏对回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企图开辟澧州、石门新苏区作为立足点。周逸群，万涛为代表的“特委马上反对他的意见，要他将第二军团迅速开回南、华、安与公安一线，‘有阵地的向前进攻，有后方地向外扩

大”。在他们上山之后，特委又连派三十多起交通找他们，要他们回苏区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冲破敌人的“包围”。⑩”但邓中夏没有接受这个正确主张，“不但回顾苏区，反要特委全部到松滋开会。特委当即派人去洽商，要其回师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以及收复已失苏区及造成公、南两县赤色区域。”可惜，邓中夏再次坚持开辟松滋新苏区的主张，而且不经特委同意，即撤换了段德昌的六军军长职务。这时敌军步步进逼，红军却在杨林寺一带徘徊犹豫，不上不下且分散部队，六军置于杨林寺，二军置于公安一线，也未主动进攻以突破敌人的包围。十二月十七日，敌人分三路向杨林寺进攻。此时，刚收编的一支土著武装又在后方叛变，致使红二军团腹背受敌，处境危险。虽经全军浴血奋战，冲出重围，红军仍伤亡重大，仅六军即损失四分之一。二军团遭到严重挫折，便向五峰、鹤峰一带转移。

南征的失利，不仅部队遭到挫折，而且也导致了后来洪湖苏区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鉴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党内的地位，万涛虽作了抵制，但并未能彻底看清其错误和危害。

在这个过程中，留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万涛、周逸群，基本上继续执行党的“六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在狂澜面前耸起了中流砥柱。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湘鄂西苏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集中红军南下攻打中心城市等军事问题，而苏区内其他方面的工作则损失较小。

红二军团远离苏区南征途中，敌人趁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两次“围剿”。洪湖苏区军民在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的领导下，战胜了由于敌人烧杀带来的巨大灾难，重新组建了

“新六军”，还将各县赤色警卫队及赤色教导军合编为红左军和红右军，同敌人浴血奋战，挫败了敌人一、二次“围剿”，保存了洪湖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敌人的“追剿”部队集结大量兵力，分别从调关、华容、岳阳向东山合击，围困了一万多华容、石首、公安三县的群众。万涛和周逸群一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掩护了这一万多地方干部和群众骨干安全转移，为革命斗争保存了火种。

在周逸群、万涛主持湘鄂西特委工作期间，特委还先后翻印了毛泽东总结湘赣边斗争经验的几篇重要文献——《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结合湘鄂西具体情况学习和讨论，积极领导苏区军民开展军事、政治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取得显著成效。至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间，湘鄂西苏区已拥有江陵、石门、监利、沔阳、潜江、天门、华容、南县、鹤峰、五峰、长阳等十一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先后占领监、潜、石、沔、华、南、公等县城和郝穴、调弦口、藕池、朱河等重镇。“湘鄂西苏区上抵沙市郊，下抵仙桃、汉川，北至天门，南至安乡，纵横千余里，造成整个赤色区域。”此外还有大量的游击区域。

四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夏曦作为中央代表，到达湘鄂西

苏区。特委委托万涛负责接待，并陪同视察各地。

三月二十七日，夏曦在小河口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会上，夏曦宣布临时中央的新路线，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发表他短短二十天的巡视，观感给洪湖苏区工作扣上“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大帽子，声称要按照所谓“国际路线”，使洪湖苏区的工作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下，夏曦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万涛和周逸群当即指出，这些批评没有事实根据，同夏曦进行了激烈争论，会议出现了僵局。

严重的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于是扩大了讨论范围，参加讨论的除原特委委员外，各县县委书记，游击大队队长、政委，红九师师长、团长、政委都参加。大多数同志认为特委过去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增强了万涛和周逸群的信心，他俩决定坚持真理，那怕承担一切可能产生的风险。可是，夏曦却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份，蛮横地压制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指责万涛与周逸群、段德昌进行“宗派活动”，搞“封建地方主义”。其实万涛是四川黔江人，周逸群是贵州铜仁人，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与“封建地方主义”毫不沾边。不仅如此，夏曦为了使左倾冒险主义尽快在湘鄂西苏区占统治地位，强行改组了特委，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中央分局书记，要周逸群以巡视员身份去江南检查工作，实际上撤消了周逸群党内外的重要领导职务，削弱湘鄂西苏区正确路线的力量。

一九三一年五月，周逸群在岳阳贾家凉亭遭敌伏击，不幸壮烈牺牲。这样，捍卫湘鄂西苏区革命成果的重担，就历

史地落在万涛肩上。

六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了大会，宣告成立湘鄂西省临时省委。由于万涛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万涛被选为省委常委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这期间，还成立了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主席团由三人组成，夏曦任主席，贺龙、万涛为委员。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夏曦推行的错误路线对湘鄂西苏区各项工作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夏曦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指责周逸群、万涛领导的鄂西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才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强调要把湘鄂西党、红军和苏维埃工作“转变”到所谓“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上来”。规定在“平分一切土地”和“加紧反富农斗争”中“彻底改造党、红军和苏维埃。”他还认为“改组派在苏区颇活动，”要加紧“肃反”。但由于万涛、段德昌等一大批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加之夏曦刚到洪湖不久，缺乏相应的基础，错误路线虽已抬头但还未全面取代原来一系列的正确措施。

一九三一年夏，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向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时洪湖仅有红九师两个团，红三军主力七、八两师随贺龙、邓中夏远在均房一带，远水难救近火。七月，湖北省又遇特大水灾。洪湖苏区地处长江、汉水之间，湖泊河港密布，连日暴雨使得江河猛涨。堤垸又多年失修，加之国民党军队枪击修堤抢险的苏区群众，甚至在监利的上车湾掘堤实行“水淹苏区”的计划，以致洪湖苏区成为一片汪洋。严重的水灾，于红军反“围剿”的军事行动极为不便，“粮食万分困难，盐、布、医药用品非常缺乏。”

“群众正在逃荒没有盐（饭）吃，要到外面逃荒^①”。外出逃荒者约占苏区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苏区面临严重的困难，红色政权处于被扼杀的危险之中。

为了战胜水灾，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洪湖苏区，必须进行艰巨的抗灾斗争。万涛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水灾时期党的紧急任务之决议》，经省委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讨论通过。

决议指出，冲破敌人的围剿，同水灾作斗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这是湘鄂西苏区党的第一等战斗任务。为战胜水灾，党组织要“高度的动员群众”，向全体军民讲明“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聚”，“掘堤灌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要“号召群众为反对国民党淹没湘鄂西苏区，巩固苏区而斗争”。

决议还提出了解决苏区的粮食物品困难的具体措施：

1、动员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掩护抢险修堤的群众，保护未受水灾地方的秋收。

2、在苏区加紧消灭地主和富农的斗争，没收地主及其家属从前分得的土地，没收地主及其家属和反水富农家属的全部粮食、财产，没收富农大部分粮食，生产工具和私藏的现金。组织广大游击队和受灾群众到附近地区没收地主的全部粮食财产和富农的部分粮食。

3、储藏粮食，禁止一切粮食出口。

4、继续生产。联县政府及各县苏维埃政府要购买大批种子，鼓励群众抢种稻子、杂粮及荞麦等作物，增加捕鱼，使鱼、鸭、蛋成为大宗出口品，输入粮食和食盐等物品。

5、发动救济运动。动员未受灾之苏区互济会和国际工

人阶级捐款救济。

6、实行极端的节约政策。各机关绝对禁止浪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每月生活费不得超出六元。

救灾决议颁发后，洪湖苏区很快掀起了救灾高潮。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也前后两次为洪湖运去大批救灾救济物资，并通过对苏区的实地考察，编撰《战水灾》一书，记叙和歌颂了苏区人民的抗灾斗争，从而使洪湖苏区得到许多国家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就是这个救灾决议，却遭到夏曦的无理指责，说“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跟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万涛据理力争，对夏曦说：“第一，这个水灾决议没有错误；第二，即使有错误，也不该我个人负责。”鉴于决议是经过省委集体讨论通过的，夏曦只好作罢。

为了彻底改变洪湖苏区因敌人围剿和水灾造成的困境，解决关系到苏区生存的给养问题，八月二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

决议指出，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之下，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因此决定以二十五团巩固后方，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发展。二十六团的具体任务是：

1、最主要的任务是以极大决心给徐德佐旅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实力，击破敌人围剿我们之一方。

2、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并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成一片。

3、尽可能的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

4、保证随时……回到苏区。